

海上學人

吳中杰 著

海上学人

吴中杰 著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
· 桂林 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海上学人/吴中杰著. —桂林: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,
2005.10

(海边书系列)

ISBN7-5633-5612-6

I.海... II.吴... III.特写(文学)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I2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5)第061665号
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西桂林市育才路15号 邮政编码:541004)
网址: <http://www.bbtpress.cn>

出版人:肖启明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

(山东省临沂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编:276017)

开本:650mm×960mm 1/16

印张:19 字数:210千字

2005年10月第1版 2005年10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25.00元

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(电话:0539—2925659)

作者简介：

吴中杰，1936年出生，1957年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，留校任教。教授，文艺学博士生导师。性喜杂览，不拘一格，于文艺理论、鲁迅专题、中国现代文艺思潮、中国古代美学等方面都做过研究，退休之后，多作散文，将人生体验与学术见解融入其中，自成一体。主要著作有：

《文艺学导论》、《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》、《中国现代文艺思潮史》及《中国古代审美文化论》（主编）等；散文集有：《人生大戏场》、《海上学人漫记》、《旧途新旅》等。



“海边书”系列

总体策划：陈思和 周立民

-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-|
| 巴 金 | 《再思录》（增补本） |
| 周介人 | 《周介人文存》 |
| 王安忆 等 | 《月月小说》（第一卷） |
| 韩少功 等 | 《月月小说》（第二卷） |
| 吴中杰 | 《复旦往事》 |
| 吴中杰 | 《海上学人》 |

组稿编辑：郑纳新
责任编辑：杜桂玲 余 平
装帧设计：孙豫苏

两种传统(代序)



北京大学定于1998年5月4日来举行“百年北大”的庆典,是很耐人寻味的事。因为这个数字包含着一种二重组合:一百年前的1898年,是清末京师大学堂开办的年份;而“五四”则是作为其后20年左右所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的标志,北大是这运动的中坚力量。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在机构上虽然有承续的关系,而在精神上,却是完全相反的。如果没有蔡元培校长大力改革京师大学堂留下来的陋习,开创北大新学风,那么,它就绝不可能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和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锋。这样,就出现了一个问题:我们今天所要继承和发扬的,是京师大学堂的廊庙传统呢,还是蔡元培改革后的民主传统?——因为实际上北大是存在着两种传统的。

看“百年北大”的有些纪念文章,觉得对这两种传统区别性的认识很模糊,甚至还有意回避蔡元培的办学思想。其实,在过去,革命者对此的认识是很清楚的。1940年蔡元培逝世时,毛泽东在唁电中称他为“学界泰斗,人世楷模”,可见对蔡元培评价之高;1943年3月5日,重庆《新华日报》发表社论《怀念蔡元培先生》,一开头就说:“北大,是中国革命运动史上、中国新文化运动史上,无法抹去的一个名词。然而,北大之使人怀念,是和蔡子民先生的使人怀念分不开的。”也可见当时革命者对北大精神的明确理

解。不知后来何以却逐渐地变得含混了起来。

诚然,京师大学堂的开办也是值得纪念的,因为它毕竟是晚清维新变革的产物,是我国新式大学的开始。但是,这所学堂并没有学得西方大学以学术为本位的办学精神,却承袭了我国科举制度的余绪,成为学子步入官场的阶梯。京师大学堂之官气重于学气是必然的,因为在封建社会的中国,根本就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,除了少数的隐逸文人之外,绝大多数学子的目标都在于廊庙,——有些人甚至把归隐也当作做官的终南捷径。既然志在做官发财,学问自然是不必讲究的了,只要混个资格,找个好后台即可。京师大学堂的腐败,其源盖出于此。到了1916年底,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之时,情况就大不一样了。这时,不但清王朝已被推翻,企图恢复帝制的袁世凯也已垮台,民主的力量大大地加强了。同时,由于多年来商品经济的发展,中国的资本势力虽然还不够强大,但也可以为知识阶层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,进行独立的活动,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。蔡元培本来就是民主革命斗士,又在德国留过学,并到法国考察过教育,对西方教育体制深有了解,所以他可以凭借北大这个舞台,来导演一出有声有色的教育改革活剧。

蔡元培在就职演说里,就要学生打破做官发财念头,而明确入学宗旨:“大学者,研究高深学问者也。”为了活跃学术空气,发展教育事业,他十分强调学术独立,思想自由,甚至对教师在校外发表的各种政见也不过问,对他们的私德也不苛求。面对社会指责,他理直气壮地公布了自己办学的两项主张:一是“对于学说,仿世界各大学通例,循‘思想自由’原则,取兼容并包主义”,“无论为何种学派,苟其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,虽彼此相反,而悉听其自由发展”。二是“对于教员,以学诣为主。在校讲授,以无背于第一种之主张为界限。其在校外之言

动,悉听自由,本校从不过问,亦不代负责任”。(《致〈公言报〉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》)蔡元培所说,决非虚言,接着他就举出许多实例来:“例如复辟主义,民国所排斥也,本校教员中,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,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,与政治无涉,则听之。筹安会之发起人,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,本校教员中有其人,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,与政治无涉,则听之。嫖、赌、娶妾等事,本校进德会所戒也,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,以纳妾、狎妓为韵事,以赌为消遣者,苟其功课不荒,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,则姑听之。夫人才至为难得,若求全责备,则学校殆难成立。”这里,“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”指的是辜鸿铭;“筹安会之发起人”是刘师培;纳妾、狎妓者虽很难确证有多少人,但陈独秀逛八大胡同是公开的秘密,辜鸿铭不但纳妾,而且还有一套宣传应该纳妾的理论,他说:男子纳妾是天经地义,只有一个茶壶配四只茶杯,没有见过一只茶杯配四个茶壶的。而且蔡元培也的确鼓励师生在学术上发表不同的意见,甚至反对到自己头上来也并不介意。比如,胡适提倡“新红学”,提出自叙传说,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,同时必须否定旧红学的种种理论和方法,其中之一就是蔡元培的“政治小说”说和索引派方法。蔡元培未必同意胡适的新说,但却欢迎他的标新立异。正因为蔡元培实行了上述两项主张,所以当时北大人才济济,极一时之盛,学术空气空前活跃,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。

其实,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的原则,在中国,并非蔡元培一个人的主张,我们只要看看自称“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,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”的陈寅恪,在为王国维所写的纪念碑铭中,称颂他“独立之精神,自由之思想”,是“历千万祀,与天壤而同久,共三光而永光”,就可以想见这种思想原则,实际上已成为具有现代思想的学人们的共识。

既然高等学府能够以学术为主体,知识分子自然就可以摆脱对于廊庙的依附,靠自己的知识谋生。而只有摆脱依附状态,发扬独立精神、自由思想,才能改变以往专做注经家的生存状况,而进行对于真理的探求。正是由于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影响,又有北京大学教授们的带头,在中国,造就了一代自由知识分子,他们对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,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。

现代知识分子并非三家村的冬烘先生,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。北大的教授们对于社会问题大抵都很关心,而且总有自己的看法,虽然他们的思想观点和政治倾向大不相同。且不说在文化问题上,新旧两派形同水火,就是新文化阵营内部也很快地分化,但是,无论哪一派,都想保持独立精神,对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作出自己的评论。鲁迅、周作人、钱玄同、刘半农等人组成的《语丝》周刊,是他们自己凑钱出版的刊物,目的在于自由地发表一点“独立判断”,这个刊物在女师大学潮中和“三一八”惨案后,起了很大的主持正义的作用;而以胡适为代表的另一派,虽然与权力者比较接近,但也不想走入廊庙,处于依附地位,他们把自己的一个刊物取名为《独立评论》,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

正是这些自由知识分子的独立评论,大大地活跃了中国人的思想,使之走出了万马齐喑的局面。但是,政治力量想通过权力来控制学校、控制知识分子的做法,却也从来没有停止过。从段祺瑞的“整顿学风”、张作霖的捕杀学人,到国民党 CC 系对于大学的渗透与控制,走的都是这一条路子。但这种种措施,只有使大学遭殃、文人受难,对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起破坏作用。正如蔡元培所说:“大学以思想自由为原则。在中古时代,大学教科受教会干涉,教员不得以违禁书籍授学生。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,既被公认,能完全实现之者,厥惟大学。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,不

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,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掣。苟其确有所见,而言之成理,则虽在一校中,两相反对之学说,不妨同时并行,而一任学生之比较而选择,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。”(《大学教育》)据蔡元培在欧洲考察所见,即使在政治上实行专制主义的德国,其大学在学术上也是独立的,这就是欧洲文化教育事业能够快步发展的原因。所以他大力提倡学术独立、思想自由,实在是为了促使中国教育的现代化,从而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。

1997年5月

5

两
种
传
统

目录 contents



两种传统(代序)/1

复旦园里长镜头

——记陈望道先生/1

与古人交友的人

——记郭绍虞先生/7

刘翁得马,焉知非祸

——记刘大杰先生/12

终于讲席的教师

——记朱东润先生/17

岂好辩哉,不得已也

——记陈子展先生/22

不肯跟风的独行者

——记蒋天枢先生/27

复旦奇人

——记赵宋庆先生/31

应世尚需演戏才

——记赵景深先生/35

藏书家的悲哀

——记王欣夫先生/41

学府悬壶

——记吴剑岚先生/44

踏着革命的节拍

——记吴文祺先生/49

莲花落里探真情

——记张世禄先生/55

信徒的天路历程

——记乐嗣炳先生/61

把“人”字写得端正

——记贾植芳先生/80

复旦的新月

——记余上沅和方令孺先生/86

月亮上的顽石

——记孙大雨先生/92

早起的虫儿

——记王中先生/98

他走得不是时候

——记吴斐丹先生/104

纵横放谈启人思

——记鲍正鹄先生/110

不胜负荷双肩挑

——记胡裕树先生/118

美的探寻者

——记蒋孔阳先生/126

自由翻译家的不自由

——记毕修勺先生/133

洋博士的草根情结

——记朱洗先生/140

为学不作媚时语

——记王元化先生/149

拍案一怒为胜迹

——记陈从周先生/160

散淡襟怀荆棘路

——记钱谷融先生/166

自我的疏离与回归

——记王道乾先生/172

市嚣声中听雅乐

——记辛丰年先生/178

焦桐琴传清越声

——记刘衍文先生/183

失之东隅，收之桑榆

——记章培恒兄/189

北邙山上一片叶

——记叶鹏兄/208

集体项目磨半生

——记顾易生兄/216

命运的纤夫

——记施昌东兄/223

坎坷的人生道路

——记戴厚英女士/229

附录一

办学理念与学术精神

——从鲁迅在北大当讲师说起/246

顾影看身不自惭

——周作人的晚年心态/251

从表现论到喇叭论

——郭沫若文艺观的变迁/260

一个美学家的文学谈

——朱光潜的美学历程/269

文人的误区

——吴晗的悲剧/279

附录二

偶与风云值,独存豪气多(骆玉明)

——记吴中杰先生/284

后 记/288

增订本跋/291

复旦园里长镜头

——记陈望道先生

陈望道先生年轻时,是一个敢说敢干,很有个性的人物。他的外号叫“红头火柴”,是谓一擦即燃之意。这只要看他当年在浙江第一师范教书时,积极支持学生运动,敢于与封建教育当局斗争,因而被列为“四大金刚”之一;后来,在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中,因不愿受陈独秀的家长式统治和背后的造谣污蔑,终于与他闹翻,拂袖



而去,即可见出他刚烈的性格来。但当建国后出任复旦大学校长时,他已是一个老成持重、表情严肃的长者了,人们尊称他为“望老”。再加上传媒着意宣扬他的原则性、组织性,而抹杀他的个性表现,把他塑造成一个听话的好老头形象,就有点令人望而生畏了。

其实,即使到了晚年,望道先生仍旧保持着他的个性,仍旧具有独立精神,不肯随波逐流,不肯曲从于强势话语,更不肯迎合上

意来误导群众,始终保持着一个学人的良知。只是,年岁已经消去了他“红头火柴”的烈性,环境也不允许他再作金刚怒目状了。但在某些场合,还能听到他的异调奏鸣,在很多时候,还能感受到他的人情温暖。只是,传媒不肯如实报道而已。

20世纪50年代初期,上面提倡一边倒,全面学习苏联,文教领域也是唯苏联专家的意见是从。在一次科学院学部委员会议上,王力大谈苏联专家如何说,如何做,望老听得实在不耐烦了,就顶了一句,说:“王力先生,这里是我们中国!”顶得王力无话可说。在制订汉语拉丁化字母时,苏联专家提出要加进一些斯拉夫语的字母,中国专家心里不同意,但慑于政治压力,没有人敢顶苏联专家,只有陈望道出来反对,说斯拉夫语字母与拉丁字母体系不同,加进来不伦不类。他与苏联专家辩论了一个上午,连中饭也没有吃,终于将这种大国沙文主义的意见顶住了。

在复旦,他这种异见就表现得更多了。有一次,学校召开批判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大会,要望老出席,在批判会行将结束时,照例要望老讲几句话,以示尊重。一般说来,在这种场合下发言,总要顺着大会的主导方向,说几句凑趣的话,至少,总要对大会加以肯定,对发言者加以鼓励。但望老却不然,他唱的几乎是反调。他说:“学术著作应是材料与观点的结合,观点经过讨论可以提高,但如果有大量可靠的材料作基础,那么这部著作是批不倒的。只有那种空头理论,一批就倒。”接着,他却批评起那些发言者来了:“你们今天的发言,为什么都是念讲稿?讲话应该发挥自己的意见才是。”弄得主持者很是尴尬。但校报发表会议消息时,只报道陈望道校长出席了批判会并讲了话,对他的讲话内容,则一字不提。这就是所谓新闻导向吧!

望道先生自己也知道,他的话在当时是不起作用的,他也无

力抗衡时代潮流,但实在看不过去的时候,他还是要讲。直言无效,则以幽默之语出之。在某一场合,大家谈到全国普遍存在的重理轻文倾向,都很有意见,而作为语文专家的望老,却突发奇论道:“别人都说现在是重理轻文,我看倒是重文轻理。你们看,现在报刊上文章很多,但是说理很少,这不是重文轻理吗?”望老说得一本正经,听者为之绝倒。闻此言说,我乃悟到,望老为什么要把他主持的专门研究语法、修辞的研究室,再加上逻辑二字,定名为“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”,盖因逻辑观念、理性思维实在是非常重要的,非要着重研究、加以推广不可。

大跃进时期,复旦掀起了集体编写教材的热潮。此热潮席卷文科,无人敢于抗拒。因为在当时,对此事的态度,就是衡量你对“三面红旗”(指总路线、大跃进、人民公社)的态度,乃一重大政治问题,弄不好,是可以被打倒的。但望老并不紧跟,仍旧保持自己的见解。他对身边的人说:“这种东西,剪刀加糍糊,一个星期就可以编出一本来,没有什么意思。”所以,那时他不参加什么集体项目,后来也不肯主编这类东西。他一向认为,做学问应该踏踏实实,不能贪多求速。他不喜欢“著作等身”之类的话,认为这样毫无意思。据他的老学生倪海曙说,他常常用“驼子下棺材”这句歇后语来形容认识的发展过程,意谓一头着实地了,一头又翘起来。因此,研究学问要“若存若忘”,长期坚持,不断探索,不断验证,才能有所成就。

“文化大革命”之前,学生会曾请望老题字,当时有许多政治口号,极为红火,学生会干部希望他能写上一句,但他不肯,只题了“又红又专”四个字,因为对这个口号,他是赞成的。但这幅字,大概不被重视的缘故,早不知被人丢到何处去了,他儿子想去找回,也没有找到。